

第六编

平反冤假错案

【专家论谭】

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

戴 煌

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

——胡耀邦

一、把‘四人帮’颠倒了 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

粉碎‘四人帮’后第六天 即 1976 年 10 月 12 日 叶剑英老师
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北京东城富强胡同 6 号胡耀邦的家
里看望胡耀邦。胡耀邦十分高兴地说：“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
们一道 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！”

胡耀邦接着说：“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。中兴伟
业，人心为上。什么是人心？第一是停止批邓，人心大顺；第二
是冤案一理，人心大喜；第三是生产狠狠抓，人心乐开花。务必
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。”

谈完正事 耀邦问叶选宁：“你能见到华主席吗？”

叶选宁说：“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。”

“如果你能够见到他 请你把‘中兴伟业 人心为上’这句话转告给他。”

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，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同志的回音 而与“中兴伟业、人心为上”停止批邓、清理冤案、生产狠狠抓的核心要求相对立的“两个凡是”——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”却出台了。按照“两个凡是”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

错误发动和领导的“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，还要“每隔七、八年来一次”；

天安门广场的“四·五”运动仍然是“反革命事件”；

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决定照旧有效；

建国后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冤假错案，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。

所有这一切，都被当时的华国锋归结为“抓纲治国”四个大字 这个“纲”就是“阶级斗争为纲”。抓着这个“纲”去治国 就是说在继续狠抓“阶级斗争”的前提下，去治理我们这个几乎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……

这等于给“中兴伟业，人心为上”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！

对此 陈云同志说 从粉碎“四人帮”到第二年3月 仍然“大有杀气” 邓小平同志更直接了当地对人说“两个凡是”不科学。胡耀邦同志说：这哪是人心为上，而是乱箭穿心嘛！

1977年3月底，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：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。当他踏进颐和园北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，他仍在为如何针对“两个凡是”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苦苦思索着。

5月24日,邓小平同胡耀邦、王震谈话时说:“前些日子,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,我对他们讲,‘两个凡是’不行。”邓小平阐述道,我们不能把毛泽东针对某个问题的讲话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,或把他关于某个地方的指示套用到另一个地方!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。

小平同志的谈话,使耀邦找到了冲破“两个凡是”的突破口。

一天下午,耀邦同志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,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,对他说:

“我想让你写个东西,你敢不敢、怕不怕?”

“怕倒不怕,不过究竟写啥?”杨逢春说。

“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。”

“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。”

“这不成问题,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,如有困难,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。”

“那好,我尽力而为。”

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、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扬、陈中以及《人民日报》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,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。

耀邦说:这二十年来,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,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。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;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,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,诬陷好人。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危机。粉碎了“四人帮”,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,以全面恢复党的“八大”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。很可惜,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好转机,现在,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;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,还需要一个过程。对这样一个过

程，既不能操之过急，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，但也不能松松垮垮，得抓紧。

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：在革命战争年代，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，国民党固然比不上，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。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，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。但从 1957 年开始的 20 多年来，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，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。所以，耀邦说：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，平反冤假错案，把林彪“四人帮”颠倒了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把大量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，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，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。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，非此莫属！

可是，耀邦一转语气说，时至今日，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。他们以种种借口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。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。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，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，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《把‘四人帮’颠倒了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》。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，可以随时来找我，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。

有人问：“文章可以写多长？”

耀邦说：“《人民日报》的一个版面有多大，文章的块头就多大。”

“多长时间拿出来？”

“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，当然快一点好。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！”

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，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。耀邦首肯了杨逢春、叶杨、陈中的写作提纲后，不到一个星期，就拿到

了初稿，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。《人民日报》的同志后来也参与了修改，前前后后共修改了 17 次才定稿。

定了稿，耀邦却让先放着，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发表。1977 年 7 月，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，艰难复出后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这是对“两个凡是”的一个重大突破。耀邦仍认为发表文章的时机未到。他说，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，应该期待原来强调“两个凡是”的同志，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，能够接受党心为上、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，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，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。

但是在 1977 年 8 月召开的党的“十一大”，华国锋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，尽管也说了“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”，说“四人帮”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，却只字不提“平反冤假错案”。在这个全面落实干部政策、平反冤假错案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上，使人们很失望。

这时，耀邦感到，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。到 1977 年 10 月 7 日“粉碎‘四人帮’”一周年，《人民日报》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予以全文刊登。

广大读者看出了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。

文章说：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，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。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“四人帮”们摧残破坏殆尽。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，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、造谣、栽赃、陷害，实行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。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，流毒甚广，危害极大。但是，至今有些同志，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，由于受“四人帮”流毒的影响，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前面，工作很不得力，致使一部分有路线

觉悟、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，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，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。这些都说明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。一切共产党员、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“四人帮”斗争的最前列，坚决把“四人帮”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，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。

此文一出，石破天惊！一个月之内，《人民日报》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，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、来电可装两麻袋。这些信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。有的说：“深受感动，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”；有的说：“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”；有人则“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，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”。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：“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，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，认为这下一家子可以盼到大天亮了……”

然而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“大天亮”，远非易事。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，一些省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“顶牛”，尤以一向都是“审干”、“定案”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。有的组织部干部打长途电话责问《人民日报》：“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，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？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，这么多案子咋平反？这只能搞乱局势，制造新的不稳定！”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说：“这事很难办”，缘由是：“前任首长批的，现任无权过问”；好不容易定了的案，现在不能翻烙饼”；揭批“四人帮”、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，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”……说得最软和的，也是“问题太复杂，只能慢慢来”。

怎么办？

《人民日报》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

头。耀邦说：“这不奇怪。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，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。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，这风还刮得很猛烈，简直是台风十二级。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，坚持不懈地努力，最后总会取得胜利。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‘十二级台风’相抗衡的关键时刻。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，就决不后退，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。

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坐的同志：“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。”他希望这些同志“都有当仁不让、坚韧不拔之志”。

那么在党的“十一大”刚刚结束后的这股“十二级台风”究竟风源起于何处？人们的目光所及，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。

二、为了平反冤假错案，胡耀邦说： 我们不下油锅，谁下油锅！

郭玉峰，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，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“最优秀的”。文革后不久，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和中监委“支左”，接着就肩负起全权掌管中组部的重任。在他的把持下，现在中组部对落实干部政策、平反冤假错案持消极、抵触态度。这里的门难进，脸难看，话难听，事难办，常常把来访的党员、老干部拒之于千里之外。许多老干部说它像一座“官衙门”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，想诉说诉说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对他的诬陷。

迫害，要求落实政策，给份工作。不料郭玉峰竟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。

本来，舒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很多老战友和老部下，但经过十年动乱，音讯隔绝，他不知这些同志情况怎样，不便冒然拜访，只得摸到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暂住，等打听出有熟人可投时即离开。郭玉峰闻报，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。这些奉命办事的人对舒同恶狠狠地说：“郭部长指示，你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！”

此刻在北京 在中央各机关 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‘挂’着。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、楚图南，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，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，竟被人统称为“社会糟粕”而没人敢用，只得在家呆着。

在外地，被“押解”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，要求早日“天大亮”。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：“人生能有几个十年，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，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！”

这些 郭玉峰充耳不闻。

那么 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陈野苹、袁任远、张策、张志杰、杨士杰等一批老同志呢？都一样，也不给他们落实政策。粉碎了“四人帮”后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天天扫院子，连办公大楼都不准迈进一步。

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为了党的命运，也为了个人的尊严，纷纷奋起抗争，被迫使用了那时通常使用、他们此刻也不得不使用的大字报。一刹时，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。许多大字报认为，这些年，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，才真正成了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“阎王殿”；这个“阎王殿”的特色是门难进、脸难看、话难听、事难办，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。还有些大字报厉声斥责这位中组部领导，继续糟蹋坑害党

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！老同志们强烈要求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。

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众多的大字报，不免大吃一惊。立刻叫一些还能接受其颐指气使的人“赶快撕”。于是他在前面叫人撕，老干部又在后面跟着贴。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杨士杰，把被撕下来的大字报，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街的《人民日报》。还有人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。

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，急得在屋内来回疾步走，并连连轻声自语：“我们不下油锅，谁下油锅，谁下油锅！”

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，请来了《人民日报》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：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的层层阻力？下一步怎么办？耀邦说：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，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。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仍然关山险阻。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，一关一关地闯过去。但丁在他的《神曲》中说过：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，我们的说法是：“我们不下油锅，谁下油锅！”下一步，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，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作为，同时发表由点到面的落实政策的消息，逐步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。

他与大家几经研究，确定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》。文章应着重挑明，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，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，患得患失，能拖则拖，能推则推，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。

耀邦动情地说：革命战争年代，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，就象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，感到十分亲切温暖。但是这些年，由于林彪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的破坏，干了不少坏事，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。我们要在深入揭批“四人帮”

的过程中，彻底批判这种反常状况，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，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‘党员之家’和‘干部之家’……

1977年11月2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“本报评论员”的文章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》的总标题下，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。接着，《人民日报》连续刊发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。

这时，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，《人民日报》又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一批新大字报，整理成一篇《情况汇编》。题目叫《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》，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给了叶剑英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同志。

在叶剑英、邓小平、陈云老一辈领导同志的积极干预下，1977年12月初，中央决定，郭玉峰调离中组部。经叶剑英、邓小平、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，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的第一把手。由此，中共中央组织部才终于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。

三、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的 “一句话、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”

胡耀邦于1977年12月15日到中组部后，立即与全体同志见面。中央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，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他的一句话、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。

那句话是“积案如山，步履维艰”。

耀邦说：“这山究竟有多高，光是人人熟知的‘文革’期间的

重大案件 诸如天安门事件‘六十一人’问题内蒙古‘内人党’问题东北的所谓‘叛徒集团’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所谓‘叛徒集团’问题 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的‘恶毒攻击伟大领袖’，‘恶毒攻击林副统帅’而被杀头的‘现行反革命’案件 等等 究竟有多少受害者，谁也说不清。‘文革’前的历次政治运动……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，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 等等 这叫“积案如山”耀邦说 对于建国后和“文革”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，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，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，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，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，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，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但是 阻力是很大的 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 还是不少的。我们每向前迈一步，其难其苦都如攀登喜马拉雅山，所以说“步履维艰”！

耀邦说 不管如何“维艰”我们也要有“会当凌绝顶”的决心。为此，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：

一、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，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“党员之家”和“干部之家”，一扫这些年来“门难进、脸难看、话难听、事难办”的官衙恶习，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、干部，不论党龄长短、资历深浅、职务高低 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 无话不可谈、无事不可求，把“四人帮”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。

二、“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，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。请任何人不要阻拦；凡是信封上写有‘胡耀邦’三个字的来信 都请及时送给我 如没有我的表示，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 更不能扣压……”。

散会后，他立即采取一个大动作：把中组部所有还在“靠边站”的老同志——杨士杰、张策、章蕴、曾志、蹇先任、陈野苹、何载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，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，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、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。

谈完话，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，并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，这个局有一位局长和六位副局长，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。不久，曾被错划为“右派”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……

如此放手大胆，雷厉风行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。此后，中组部的同志坚决贯彻落实耀邦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，对推动平反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四、胡耀邦身体力行， 中组部重新成为“党员之家”

中组部的同志们认真贯彻耀邦在见面会上所提的要求，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的平反尽职尽责，而耀邦也身体力行，夜以继日地工作。从此，“党员之家”的美名重新大振。

1978年1月，胡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工作就绪后的第一个月，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，全月来信达6麻袋。

在这许多来信中，有一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的联名信反映，对外文委已被撤销，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有关各部，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“没人要”，特向“党员之家”、“干部之家”求助。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，司局级干部14人，处科级干部86人，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100人，其中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、楚图南、原驻

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、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。

耀邦看了信忿忿地说：“这简直是瞎胡闹！对夏衍、楚图南、曹瑛、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，怎么都诬称他们为‘社会糟粕’呢？怎能因为他们的‘家庭出身’和‘海外关系’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，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？‘文革’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，难道还不够重吗？”他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，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，由干部组的成员带队，前往调查研究。

工作组兵分数路，跑东城走西城，一一看望了这批著名的老同志，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，请所有长期受压抑、遭冤的同志畅所欲言。这 205 位同志都深受感动。他们表示：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，中组部就派人了解下情；“党员之家”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。

工作组前后忙了十余日，写出的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《情况简报》，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：

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；

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，一抓到底，限定时间，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；

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“领导上第一线、一抓到底、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”的办法。

依照这个批示，中组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，不但迅速解决了对外文委 205 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，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“靠边站”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。

消息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、北京各高等学校，中央民族学院（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）讲师郑仲兵，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成

了“党员之家”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 明言要找胡耀邦。接话的人回答：“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，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？”郑仲兵说了声“行”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。

郑仲兵说：“‘文革’之初 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《公安六条》 滥杀无辜 我私下表示过不满 并说过谢富治、江青、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，结果就被打成‘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’ 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 两次被送进监狱 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，差点送了命。现在粉碎了‘四人帮’ 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 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 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。”

“好的，陈野苹说，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 请你放心。”

不久，胡耀邦就亲自过问了这件事，他想亲自找郑仲兵谈话，后因有急事改请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。这位局长对郑仲兵说：“耀邦同志说：‘一、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 向你表示慰问 二、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 三、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，耀邦同志等着要……’”

后来，郑仲兵与中组部同志接谈后不久，公安部就给郑仲兵做出了平反结论，恢复了名誉。

一天，著名老报人恽逸群，到北京申诉他的延绵 26 年的沉冤。

这是一位 1926 年 7 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。1932 年奉党的指派进入新闻界 先后担任过《立报》主笔和《译报》、《导报》总编辑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他相继担任过《新华日报》华中版部编辑和社长、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、华中新闻学校校长、山东《大众日报》总编辑。上海解放后 出任上海《解放日报》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校校长、复

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，并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前身——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。

1952年3月，恽逸群因两条“罪行”被开除党籍。一是1950年，他曾给上级党委写信反映其地主姐姐被打伤的情况，并请求允许其姐入院治疗；二是他将《解放日报》的一笔公款供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。他被开除党籍后，1955年，发生了潘汉年冤案，他又因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，而于同年5月10日被秘密逮捕。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。查明他与潘汉年纯属正常的工作关系，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。在这十年半中，他一直被孤囚一室。同年11月下旬，最高人民法院判他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。

1965年12月8日，他被“假释”离京，并严嘱“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”。然后被安排到江苏省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，每月只给生活费37元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全面展开，他又被“群众专政”关进了“牛棚”，成年累月地挨批、陪斗、挂牌示众，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，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哮喘症。1976年10月，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，71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，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赶京申冤，但无人问津。

1978年夏天，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“党员之家”，立刻到中组部上访。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，热情慰勉，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，并介绍他去见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，申请撤销那“有期徒刑11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”的原判和恢复名誉。当年8月，中组部根据恽逸群本人“先工作”的迫切要求，把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，每月生活费暂定120元，其他待遇、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。

1980年4月，最高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，宣

告恽逸群无罪。

1982年10月，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。并经中纪委批准，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，恢复其党籍。

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，遵照《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、恢复名誉的通知》精神重新为他作了结论：“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6年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，在上海、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，为党做了不少工作，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。1955年，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，蒙冤二十余年，应予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，消除影响。”

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，于1978年12月10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，虽然，彻底平反，恢复名誉晚了一大步，但在胡耀邦与他长谈之后，他就预感他的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，所以在享年73岁临终时，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。

秦川，又一位老报人，也曾踏入耀邦家门槛，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“大跃进”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坎坷遭遇。

“大跃进”时，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，听到各地对“大跃进”颇多非议。他去江苏、福建、江西、四川、陕西等地深入调查，觉得浮夸风和对自然环境的毁坏等情况确实非同小可。回到北京汇报调查所得，他说，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告诫全党，主观主义能导致亡党亡国亡头；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，主观主义也照样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。他说，在全国，现在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，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。但在个别地区，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，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……

他的这番议论很快传到康生耳里，康生认为这是“社会主义